



启蒙与世俗化

东西方现代化历程

赵林 邓守成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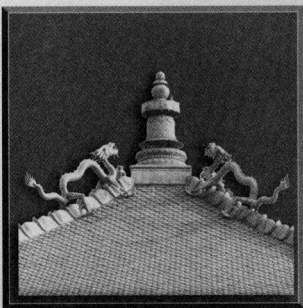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赵林 邓守成 主编



启蒙与世俗化

东西方现代化历程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赵林,邓守成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

ISBN 978-7-307-05990-0

I. 启… II. ①赵… ②邓… III. ①启蒙运动—研究—西方国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现代化—历史—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504-53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832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金诗灿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4.125 字数:347千字 插页:1

版次: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990-0/B·201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者序

启蒙运动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甚至被人们当做西方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真正分水岭。“启蒙运动”这个概念的法文为 *Siècle des lumières*，德文为 *Zeit der Aufklärung*，英文为 *the Enlightenment*，均含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启蒙”二字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无非就是开启理性精神、驱除蒙昧信仰的意思，因此启蒙运动通常被看作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启蒙运动就是一场反基督教的文化运动，它的代表就是18世纪那些高举着无神论或者自然神论大旗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达朗贝等人。

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指出：“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①启蒙运动是与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勃兴密切相关的，而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共同根基就是理性精神，因此，启蒙运动的精髓和实质无疑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感觉主义，以及宗教改革运动所弘扬的信仰主义，都是大相径庭的，它构成了17、18世纪西欧社会的新兴的时代精神。

在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代，南部欧洲拉丁语文化圈里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而北部欧洲日耳曼文化圈里则爆发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思想文化运动虽然对于突破中世纪的沉闷文化氛围、打破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思想专制格局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们二者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带有浓郁的中世纪气息。无论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都是非常保守的，它们的理想不是指向古典文化，就是指向教父时代。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的哲学家一样盲目地崇拜权威，只不过是用古代的权威取代了教会的权威而已。“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保留下来……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让人对古代样样荒诞无稽的东西广开心窍。”^②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们，同样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的态度。无论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神学思想和三个“唯独”的口号（“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还是加尔文的带有浓郁神秘色彩的双预定论，都是把信仰高高地凌驾于理性之上。因此，整个16世纪西方文化的基调是感觉主义（南部欧洲）和信仰主义（北部欧洲），而理性主义的发展壮大是从17世纪才开始的。

理性主义在17世纪的生长首先表现为普遍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这种怀疑和批判当然是针对着当时强势的基督教信仰的。在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所开拓的一片荒漠之上，近代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发展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近代科学和哲学必然要与建立在启示之上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发生尖锐的矛盾。面对着这种矛盾，人们既可以采取一种极端的做法，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也可以采取一种温和的做法，在矛盾的双方之间寻求妥协。因此，如何用新兴的理性精神来批判、超越甚至根本否定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这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堪称典范）；但是如何使新兴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相协调，使基督教信仰本身从一种反理性的信仰日益转变为一种合理性的信仰，这同样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17世纪的英国人和18世纪的德国人作出了表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后世人们谈起启蒙运动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后面这个重要内容忽略了。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对启蒙运动的简单化和模式化理解，把启蒙运动仅仅看作是一场反基督教的运动，忽略了它同时还承担着一种把新兴的理性精

神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相协调的重要使命。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之所以对基督教信仰采取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信仰，是由当时法兰西的天主教思想专制与波旁王朝政治专制沆瀣一气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但是在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和政治立宪的英国，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正如同立宪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样，并没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17 世纪的英国人是温和而审慎的，他们既推崇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也珍视自己世代相袭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会像 16 世纪的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那样用狂热的信仰来压制理性，也不会像 18 世纪的法国无神论者那样用独断的理性来否定信仰，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妥协（正如他们在 1688 年“光荣革命”中力图在国王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一样），从而确立起一种合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在 17、18 世纪，英国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启蒙运动在英国并没有像在后来的法国那样，掀起宗教批判的惊涛骇浪，而只是开启了一条潺湲平缓的思想细流。在这条思想细流中，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与新兴的理性精神和谐地交织融会在一起。

由 17 世纪的英国人所开启的启蒙运动之思想源流，到了 18 世纪的法国人那里，很快就被推向了极端，从而造成了振聋发聩的巨大效果。其结果，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场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基本特点就是对基督教的猛烈批判。伏尔泰、霍尔巴赫等法国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固然是激烈而犀利的，却谈不上深刻。他们把基督教以及一切其他宗教都看作是欺骗加愚昧的结果，这种偏激而片面的看法恰恰反映了法国启蒙思想家自身的浅薄性。当这场被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人推至极端的启蒙运动，传播到深刻而晦涩的德国人那里，则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18 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如沃尔夫、莱辛、门德尔松、康德、哈曼、赫尔德等人）固然继承和发扬了由英、法思想家所代表的时髦的理性精神，但是他们同时也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路德所开创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中。面对着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民族性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张力，德

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然而他们在一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力图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把普世的与本土的、理性的与信仰的东西协调起来，而不是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简单地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在这方面，近代德国人作为一个落后民族（相比起同时代的英、法、荷而言），他们在启蒙运动中对待普世理性与传统信仰的辩证态度，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

相比起西方诸国，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自己的特色。一些研究者们以大量的材料证明，自从明朝中叶（嘉靖年间，16 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启蒙思想的涓涓细流。^③如此算来，中国的启蒙思想比西方还要早一个世纪，但是它的历史效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开启科学、民主之理性精神的结果，却是一次次又落入了专制蒙昧的窠臼之中。明清时期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们（如王艮、李贽、袁宏道、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戴震、袁枚、龚自珍等人），就如同口衔嫩枝的报春之鸟，一批又一批地冻死在寒冷冬日的尽头。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启蒙过程出现了一种“黎明翘首可望，黑夜却漫无尽期”的奇特历史效应，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三百年之久。到了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渗入，中国人才开始踏上了一条全新意义的启蒙历程，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推崇“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潮席卷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无论是倡导“全盘西化”的激进人士，还是主张弘扬国故的保守主义者，都像 18 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深切地感受到外来的价值理念与本土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等一系列“古今中西之争”中，论战各方尽管立场、观点相异，但是在主观动机上却都怀着一种试图协调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良好愿望。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和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于启蒙的兴趣逐渐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相对于弘扬理性精神、倡导科学民主而言，救国保种的问题更加迫在眉睫。从此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政治冲突等种种原因，启蒙的问题在中国长期被搁置于人

们的视野之外，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今天的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一个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与18世纪德国人所面对的启蒙问题颇为相似，其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如何处理由西方现代文化所代表的普世性价值理念（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等）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中，普世的与传统的这两条相互交叉的线索将会交织出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全球价值”与“中国特色”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融会？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以夏变夷”，还是脱胎换骨式的融合更新？这些问题都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来共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启蒙运动以及中国明清以来的启蒙思想脉络进行一番重新梳理，无疑将有利于我们克服现实的困惑，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2006年9月17~19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本论文集就是对部分会议论文进行翻译、汇编的结果。我们希望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的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启蒙运动、世俗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且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赵 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 邓守成

注 释

-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6页。
-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6页。
- ③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著作当数萧萐父教授和许苏民教授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

目 录

编者序	(1)
-----------	-----

一、关于“启蒙”的再反思

宗教与欧洲启蒙运动	斯图亚特·J. 布朗(3)
英、法、德启蒙运动之比较	赵 林(28)
《明夷待访录》: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冯天瑜(45)
20 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邓晓芒(62)
谁启蒙谁?	
——康德论启蒙的再思	林鸿信(76)
良心和启蒙	谢文郁(94)
中国的启蒙:祛魅、立人、改制	许苏民(112)
“第二次启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宗教	邓守成(134)
英国自然神论与启蒙运动	王爱菊(149)
从索齐尼主义到自然神论	
——英国自然神论的神学来源	李斯(158)
试论英国早期启蒙哲学的自然神论背景	
——以上帝观念在约翰·洛克哲学中的地位为例	周玄毅(168)
施莱尔马赫论虔敬	
——对启蒙运动的一种神学回应	郭鸿标(177)

二、世俗化与现代性

神圣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新启蒙观	赵敦华(197)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宗教	休·麦克劳(207)
政治宗教	沃勒·尤斯朵夫(225)
宗教与世俗化	
——中美欧现代化历程中宗教的发展与变化	王忠欣(262)
启蒙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俗化(或神圣化)历程	陈家琪(279)
从明清之际价值观念的变化看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吴根友(286)
儒学价值与当今世界	胡治洪(296)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邓安庆(302)
文化的自我转型	
——戴震与尼采	刘沧龙(317)
论自由主义知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与命运	
——以胡适所倡导的不可知论、怀疑论为中心	张星久(339)
再神圣化与文化保守主义	
——世俗化的遗产	威廉·埃德加(346)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想主义何以可能?	
——论杜威宗教观的当代意义	童世骏(354)
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和谐	王晓朝(368)

一、关于“启蒙”的再反思

宗教与欧洲启蒙运动

□ 斯图亚特·J. 布朗

(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系教授)

一、引言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纷繁复杂而且具有很大差异性的文化运动，波及绝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还跨越大西洋影响了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启蒙运动肇始于17世纪晚期，在18世纪达到顶峰，涵盖了一大批在民族、信仰和政治观点上非常多元化而且跨度很大的思想家。虽然彼此殊然迥异，这些思想家却自认为共同组成了一个知识的理想国，因为他们有一些基本前提和态度上志同道合，并投身于一项共同事业。在他们掀起的这场运动中，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相信宇宙受永恒统一的法则所支配，而且通过理性——人心之中客观的、具有批判性的而且符合逻辑的活动——人类完全可以了解这些宇宙规律。启蒙思想家们赞同一种夸大了人类潜能的观点，对于未来充满乐观精神。他们相信，在经历了好些个世纪的黑暗和迷信之后，人类终于迎来了亮堂堂的白昼。思想家们的这份激动兴奋和乐观主义集中体现于当时一种颇具特色的出版物——“百科全书”。所谓百科全书，是指人类知识的皇皇大全，而当时在全欧洲出现了无数种版本的“百科全书”。许多人都深信不疑，通过理性，人类可以知晓一切，无论是像永恒不变的宇宙万有引力这样的自然规律，还是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以及支配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社会规律，甚至还可以了解人

类的思维过程，了解感官知觉是如何通过这个思维过程而转化成观念的。

与启蒙运动相伴的是对基督宗教的批判，这不妨说也是自欧洲皈依基督教以来基督信仰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思想挑战。有些启蒙思想家——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过也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认为基督教与理性相违背，故而是谬误。他们以理性的名义拒斥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譬如三一论、童贞女生子、宝血救赎、洗礼、圣餐、最后审判以及圣徒交通等。他们还拒斥原罪说这个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否认人性在本质上存在缺陷，并且反对如果没有神的佑助，人便注定会在建立公正道德的社会时一再受挫。对于包括伏尔泰和休谟在内的这些启蒙批判者而言，基督教只是一种迷信的形式，而当人类进入新纪元的时候，基督教必定会被抛诸身后。在他们看来，教会的历史无异于一部宗教战争、迫害、屠杀、残暴和宗教不宽容的黑暗记录史。他们认为，数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教职人员一直都在诉诸人们惧怕想象的惩罚与期望虚幻的奖赏的心理来控制束缚他们。各大教会一直都在支持，并将继续支持欧洲大陆的各个政府压迫民众，支持它们通过神秘、魔术以及权威这些手段来操纵普通大众。不过，现在才真正有希望获得解放。伏尔泰说过，“要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这正是他号召人们对教会展开启蒙之战的响亮口号。

不过，这种对宗教的极端批判，只是局限于少数启蒙思想家。虽然基督教的批判者们大胆激烈的著作让人迷恋难忘，我们却不应该夸大启蒙运动中的反基督教倾向。虽然有一些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的确对基督教大加抨击，可是毕竟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仍然坚定地固守在基督教传统之内。实际上，教职人员之中许多人都对启蒙运动抱着赞赏的态度。他们努力修改基督神学，不再关注神迹和超自然的事情，提升道德教训的地位，并推崇一个合乎理性而且仁慈善良的上帝观念。他们强调基督教的本质要义，并将之界定为以拿撒勒的耶稣的简明教义为基础的实践道德。有些人还认为，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督教能够促进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宽容，并能为基督教的重新团结开辟道路。简而言之，这就是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其领

袖人物包括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莱辛，苏格兰的弗朗西斯·哈钦生、托马斯·雷德和威廉姆·罗伯特森，英国的约瑟夫·巴特勒、威廉姆·沃博顿，以及日内瓦的托伦提。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启蒙运动中的宗教因素，尤其是基督教启蒙运动。^①

本文将讨论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和基督教启蒙运动这两个方面，而焦点问题就是在近代欧洲早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教。本文将具体研究启蒙运动的前提和方法如何一方面导致了某些启蒙思想家拒斥基督教，又在另一方面如何导致了另外一些思想家设法改造基督教，使之成为启蒙运动的关键担当者。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启蒙运动的确大大削弱了基督教各派教会的影响和权威。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启蒙运动却让基督信仰重获新生，因为它使得基督信仰越来越看重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教训、个人体验的重要性、上帝的仁慈和合乎理性以及基督信仰的普世本质。

二、欧洲启蒙运动

首先，简略介绍一下欧洲启蒙运动的根源和本质。启蒙运动有多重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是对宗教战争的反动。宗教改革以后，因宗教原因而导致的战事频繁爆发，几乎摧毁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其顶峰是1618~1648年间在欧洲中部进行的30年战争和17世纪中期在英国和爱尔兰展开的三国之战。这些战争冲突，充分表明了宗教不宽容所付出的毁灭性代价，同时也令人思考为何一个以和平和怜悯为根基的信仰竟然会导致如此惨痛的伤亡和苦难。除此之外，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内部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仍然在进行。例如，法国在1685年废除《南德法令》，并流放了约20万名法国新教徒。1686年，法国的萨沃公爵将韦尔多教派驱逐出他们居住的彼德蒙特山谷。1731年，奥地利帝国将2万新教徒逐出萨尔茨堡。这些行径似乎显示了公开的宗教冲突有重新抬头的危险。当然，有些思想家已经提出，此时应该考虑某种社会建制形式，避免通过暴力强制来推进

宗教统一。除了这些对于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质疑之外，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发展和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和宗教的接触和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接触让人们对基督宗教所谓的唯有基督教才是人类繁荣所必需的真理产生了怀疑，并逐渐令欧洲人放开眼光，对人性和宇宙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理解。

启蒙运动还来源于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重新发现。随着远古时代的文献著述不断被发现和出版，一场早已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的文化复兴继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古代哲学家的批判方法，特别是他们对包括宗教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进行严谨的质疑的方法，大大地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从古代人对罗马异教徒宗教的批判中，启蒙思想家们不仅获得了可供他们自己用来批评不宽容的基督教的方法，而且还接受了古代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俗世哲学。从古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特别是从希罗多德和托勒密的著作中，启蒙思想家们重新获得了一种历史感。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吉本、孟德斯鸠、威廉姆·罗伯特森、荷尔德、亚当·弗格森和伏尔泰。他们寻求以古典模式为基础，探索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并试图厘清支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②按照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话来说，他们试图将“人类的伟大地图”铺展开来。^③

或许最深刻地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因素是近代科学的兴起。自从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思想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新的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这些方法包括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对经验数据的逻辑陈述，而更重要的是运用数学来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实验法，即用一切有学问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反复进行的实验来检验和验证理论。通过观察和实验，新科学的倡导者们逐渐推翻了传统的基督教宇宙论。传统宇宙论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被具有固定天体的多重透明天空所包围。然而到了17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有着无限外延的空间，而位于其中的恒星、行星、卫星和彗星则按照在整个宇宙之中始终不变的自然规律运转。这些自然规律还包括决定了绕太阳运转的行星拥有椭圆轨道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让我们重新

理解宇宙的关键人物，就是象征着理性时代的英国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曾经写过以下著名的诗句：

自然和自然律隐匿于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一切俱成光明。

科学揭示出来的宇宙新图景，即“牛顿式宇宙”，将地球及其居住者从宇宙的中心位置排除出去。地球现在不过只是一个小黑点，围绕着一颗小恒星运转，而这颗小恒星也不过占据着在无限空间中旋转着的无数星系之中某个星系的荒凉一角。不过，这仍然令人无限兴奋，因为这种对支配着宇宙浩瀚空间的规律的理解毕竟是人心通过理性得以发现的。此外，在矿采业、航海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方面，科学也正在向人们指明物质生活得以实际改善的道路，并昭示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某些思想家而言，与圣经经文的权威以及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的教训相比，科学提供了一条更为确定的通往真理和人类真正繁荣的通途。

到了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一个独特的精神社会，一个知识的理想国，共同致力于通过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这些思想家主要是城市居民，如中产阶级当中的商人、记者、职业人士和熟练工匠等。他们非常喜欢在适宜愉快的环境里聚会、讨论和辩论。他们组成了文学团体和辩论俱乐部，或在咖啡馆和酒馆里聚会，或在私家宅第和公共学院里聚会，彼此保持通信联系，并且利用正在兴起的出版业之便利来传播他们的著述。许多人还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他们开始对城市规划、公共建筑、公园设计和发展卫生系统产生兴趣。他们还对已有的社会建制，特别是对那些根植于传统和古旧习俗的社会机构，多有批判之词。他们坚持认为，理性正在揭示支配着社会和自然领域的规律的存在，而启蒙思想家的任务正是去发现这些规律并将现存的一切社会机构置于理性的检验之下。另外，还应该对社会法律和习俗进行改革，使之符合自然法则，反映自然正义。启蒙思想家们经常提到的是所有公民都拥有的自然权利，